

# 数据主义理论溯源及其技术人文未来

吴永忠,魏辰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数据主义代表着大数据时代的一种社会思潮,是人类意识形态上的数据化变革。数据主义的生成逻辑是文化、技术以及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古至今根植于人类内心对神秘未知力量的崇拜本性是数据主义生成的文化基石;大数据技术在信息维度上建构的“数据世界”是数据主义生成的技术动因;后真相社会导致盲目崇拜、物性依赖的双重遮蔽环境是数据主义生成的肥沃土壤。而数据主义的思想实质包含了从本体到实践的思想溯源。在本体论层面,数据主义是“万物皆数”思想的现代化发展;在认识论层面,数据主义是一种经验主义思想的回归;在价值观层面,数据主义者奉行“数据解决一切”的工具理性至上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数据主义是一种饱含欺骗性意识形态的技治主义幻想;在思想实践上,数据主义是计算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路径。数据主义的出现向人类主体性地位发起了挑战,为挽救失落的人文,数据主义应走向“技术人文主义”。技术人文主义下的一切“人-技”共生关系都是人类自我存在的新维度,一切数据自由终将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

**关键词:**数据主义;计算主义;技治主义;后真相;技术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23)02-0001-10

## 一、引言:数字化生存与数据主义

伴随着计算机的问世,“数字化”一度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数字教父”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就提出了人类的“数字化生存”,<sup>①</sup>“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其中作为‘信息DNA’的比特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sup>[1]</sup>在接入互联网后,人们开始追求数据更复杂、更高级的存在形态。于是,数字化逐渐转向数据化发展。数据化的加速转型带来了以数据为驱动的革命性转变,即大数据革命的出现。<sup>②</sup>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大数据革命的到来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前进方向。<sup>[2]</sup>大数据催生的数据世界延伸了人类的感官,社交软件、人工智能同人们的生活愈发密不可分,与之相关的应用实践均以数据的形式保存、记录和交流。显然,“数据化”的实现程度已成为当下人类生活便利程度的重要考量因素,“以数据为中心”的观念悄然诞生,数据主义由此涌现。也正是因为数据主义的出现,使数据本身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大数据技术日益自成系统,数据主义甚至被预言有脱离人的趋势。人类的主体性在数据世界变为扁平化的数字,造成主体性人文范式的衰落,逐渐走向

收稿日期:2023-02-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的民生科技发展的公正观研究”(18BZX057)

作者简介:吴永忠(1963—),男,江苏武进人,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魏辰(1997—),女,江苏徐州人,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数字化生存主要强调人类的精神性存在,即享受数字化产品使用和服务的过程,是现实世界通过计算机实现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方式。

② 早在1980年,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首次提出“大数据”概念,并称颂大数据的出现和发展是第三次浪潮中的华彩篇章。参见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254页。大数据革命是一场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其颠覆性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的转变。它将人类的思维方式从有限的选择性思维拓展到无尽的整体性思维,从二维的因果关系思维提升到多维的联想思维;它可以实时、精确、跨国界地动态存储、传输、搜索和处理变幻莫测的数据信息流,用“最丰富的数据还原最真实的世界”,有效降低人类信息检索和处理的成本。

后人类主义的发展路径。

目前,学界关于数据主义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数据主义下的数据崇拜反思,数据的强大力量使其成为这一时代的新“物神”,能够给予人们合理建议和准确预测的企业将成为数据“教会”,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数据的信徒,过度的数据崇拜使人们成为数据的附庸。二是数据主义的伦理问题及治理,其中最重要的伦理问题就是人与技术的自由关系问题,数据主义下的数据滥用与侵权导致数据巨机器的出现,进而导致人与数据的关系破裂,人的自由丧失。<sup>①</sup> 三是对数据主义进行人文批判,人文主义者认为,数据主义否定了人之本质价值,人越来越少将自己视为一个完整的人格,使“以人中心”走向“以数据为中心”。可见,数据主义已然成为学界的重要议题之一,但现有研究多倾向于对数据主义的问题反思与批判,关于数据主义的理论研究并不充分,缺乏对数据主义思想的整体梳理与考察。为解决数据主义理论匮乏问题,更全面地审视数据化发展的进程,从而挽救失落的人文,本文试图在大数据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对数据主义进行溯源,并在人文批判的基础上,寻找数据主义发展的积极未来。

## 二、数据主义的哲学意蕴:从“万物皆数据”到“意识形态数据化”

数据主义并非新事物,它与大数据革命相伴相生,是一种具有特定时代背景的社会现象。但是,关于“数据主义”这一概念,学界众说纷纭,并无明确共识。最早提出“大数据主义”概念的史蒂夫·洛尔(Steve Lohr)认为,大数据主义是大数据革命的一种后果,其带来了一场基于大数据技术产生的计量决策革命,并称之为一种“万物皆数据”的思维。<sup>[3]</sup> 而将这种观点称作“数据主义”的学者是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他认为,如今兴起的哲学就是数据主义,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依靠数据减少认知偏差,揭示全新的行为模式。<sup>[4]</sup> 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给出关于“数据主义”较为详细的定义:“整个世界都是由数据流组成的,将有机体视为生化算法,并认为人类的宇宙使命是创建一个包罗万象的数据处理系统,宇宙间一切实体或现象的意义都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只要有足够的生物识别数据和计算能力,这个包罗万象的系统可以比我们更了解人类。”<sup>[5]</sup> 这一界定涵盖了数据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内核。迪克(José van Dijck)强调了数据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认为数据化带来了全新的大数据思维和优越的意识形态。<sup>[6]</sup><sup>200</sup> 这意味着,数据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导致思维方式的革新,而且带来意识形态的嬗变。

从数字化生存的角度出发,国内学者也对数据主义进行了阐释。李伦、黄关认为,数据主义涵盖了从人类主体实践到一切相关的社会行为,强调数据的自由与至善,而人类存在于自然与数据合而为一的数据世界,也被称作赛博空间。<sup>[7]</sup> 杨子飞把这种抽象的数据世界定义为“第三洞穴”,<sup>②</sup>认为数据主义实现了现实世界在“第三洞穴”的镜像化生存,是大数据社会科学运作逻辑下的特有产物。<sup>[8]</sup> 闫坤如认为,大数据革命的颠覆性促成了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观,数据主义是一种新型还原论,万事万物皆可还原为数据,并且可以在数据集中找到一一对应关系,即世界与数据逻辑同构。<sup>[9]</sup><sup>190</sup> 数据主义者崇尚数据至上,于是数据主义成为一种全新的评判世界的标准,在各行各业中缔造数据神话。<sup>[10]</sup>

早已有学者察觉到数据在某种程度上的宗教意味。哲学家迈克尔·海姆(Michael Heim)就曾对此作出预示,认为能够效仿并超越上帝真理的最佳途径就是用信息打造真实的虚拟世界。<sup>[11]</sup> 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提出,计算机的赛博空间推进了时代的重要迷思。在数字化时代,迷思不断促进技术崇拜,数字崇拜是技术崇拜的最新表现形式。人们相信数字化会像以往技术一样创造出奇迹,因此,人们对数字化产生了狂热的迷信。<sup>[12]</sup> 尤瓦尔·赫拉利洞悉到了数据主义的宗教性质,认为数据主义带来了一场

① 数据和算法是数据巨机器的构成基础,其中,以数据为原材料,以算法为加工厂。在数据巨机器中,人们无异于服从机械律的螺丝钉。

②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存在于由概念和语言构成的“第二洞穴”。而所谓的“第三洞穴”是由抽象数据构成的“虚拟洞穴”,是直观映射现实生活的镜像世界。

宗教革命,与传统拜人或拜神不同,它推崇的是数据。<sup>[13]333</sup>这种对数据的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夹杂于“超自然”与“自然”之间的崇拜。<sup>[14]</sup>

与传统观点不同,科贝列娃(Kobeliava Dalia)等从人类进化的角度论证数据主义,认为使人类消融在数据流中的数据主义是人类进化的延续,这是一种自我存在的新维度。<sup>[15]100</sup>数据技术在征服现实世界后,继而转向征服人自身。泰德·彼得斯(Ted Peters)认为,数据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后人类宗教,数据流取代了以往的神秘联盟。当所有人都连入系统后,系统连接成为所有意义的源泉,人们成为数据流的一部分时,就会变成“比自己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sup>①[16]</sup>当某一事物成为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普遍性思维时,它实际上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性质。因此,数据主义的发展伴随着意识形态的产生。尤瓦尔·赫拉利就明确提出,数据主义是一种隐形的意识形态,正在超越经典意识形态,占据时代主流地位。<sup>[17]253</sup>德里奥·佩特里(Derio Petri)尖锐地指出了数据主义意识形态的极端形式:“数据主义者将整个世界视为数据流,认为数据可以公平、详尽地反映现实,所以对数据有无条件的信心,日常判断仅基于数据。并且,数据主义者相信人工智能将战胜人类智力,倡导宇宙数据处理概念,将生物体视为生化信息处理系统。”<sup>[18]32</sup>

由此看来,最初数据主义的提出是为了强调数据化发展的重要性,时至今日,由于对数据的无条件信仰,人类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形成的数据信息交流系统正在成为推动文明发展的独立自主力量,<sup>[15]100</sup>数据主义已成为富有时代特点的产物,即一种超感的技术意识形态。早在20世纪中叶,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哈贝马斯就预感到了科学技术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理论。<sup>②</sup>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强调科学技术是唯一的价值源泉,人们的社会交往与语言系统受抑于科学技术强大的目的理性系统,人沦为技术理性的附属品。哈贝马斯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维护资产阶级合法性的手段。<sup>[19]</sup>反观作为意识形态的数据主义,大数据技术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发展,也是数据主义产生的技术逻辑,它的进步迫使人们按照技术装置塑造自己的肉体与灵魂,<sup>[20]</sup>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方式投射到社会生活中。这造成了人类生活世界的数字化,进而导致人们的行为和思想的数字化。人的主体性本质和生活力量在数据虚拟世界中消失,最终实现人类的数据化生存。与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不同的是,数据主义的时代语境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背景,而是大数据革命下更为广泛、普遍的意识形态产物。数据主义者也并非完全为统治的合法性辩护,更多的是为自身存在性辩护。

当数据主义成为人类进化的延续时,技术对人类有构成意义,是人类的义肢性存在。为证明技术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提出了“后种系发生(epiphylogenesis)”这一概念。<sup>[21]134-142</sup>其中,“后生成记忆”是人之为人的独特性体现。斯蒂格勒认为,技术的产生源自人的内在缺陷,是人本质的外化,所以技术也被称作人类的“代具”。<sup>③</sup>由此看来,数据主义的发展也是一种后种系生成的过程。大数据技术为人类创造了可永久保存的数据记忆,并且以数据的形式塑造人的存在,为个体创造了永生的数据化身。因此,数据技术的进化与人类的进化是相互作用的耦合关系,数据技术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类数据记忆的发展。若如科贝列娃等所言,数据主义成为自我存在的新维度,那么颇为适用斯蒂格勒提

① 《圣经·新约》认为,成为“比自己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是无私的爱的最神圣的形式。

②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下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样地,技术理性也成为维护政治社会合法性的手段,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并占据这一时期的主导地位。

③ “种系发生(phylogenesis)”是生物学概念,即物种的一切特性都包含在生物学之中,其生成进化过程是展示与生俱来特性的过程。斯蒂格勒提出“后种系发生”,旨在为人类进化寻找生物学之外的因素,即物种的生成进化过程并非全部包含在种之中,存在后天形成的特性。例如,技术的进化就是后种系生成过程。斯蒂格勒从记忆的角度阐述“后种系发生”思想,将记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遗传记忆,是指物种的DNA遗传序列;第二个层次是后遗传记忆,是指生物体在特定环境中后天获得的大脑记忆;第三个层次是后种系生成记忆,是指后天习得的后遗传记忆通过非生物学的手段(雕刻、器具、文字等)保存并传递下去,是人类所独有的外化记忆。“代具”存在于人类先天机体之外,是补偿自身机能缺陷的“义肢”。

出的人类进化的“人工选择”<sup>①</sup>理论,<sup>[21]178</sup>即数据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就是“人工选择”“代具”的过程,为实现人类历史性存在的延异式在场。

另外,从后人类宗教的角度分析,由于数据取代了原有的各种神秘实体,其自身的复杂性和神秘性是推动迷思生长的主要源泉。在数据迷思下,连入数据流后的人类是“基因增强”版本的人类。因此,数据主义不仅表现为对数据迷思的崇拜和信奉,更是对数据迷思中“数据人”<sup>②</sup>的崇拜,崇拜数据的同时,也是在崇拜“自己(数据人)”。总而言之,现有研究认为,数据主义的产生是大数据技术无约束应用的一种后果,将“万物皆数据”全面渗透于人类思想,强烈地冲击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实存方式。大数据作为信息载体,形成数据系统化规则,逐渐实现对人类社会的全方位规制,人类成为了一种数据信息流。

诚如前文所言,那么,人类生命是否能如现有定义一般成为数据主义下纯粹理性的数据流?人脑究竟能否被称作算法?这一论断有待商榷。因为人类是理性与感性并存的复杂体,主体建构性是人类最显著的特征,所以人类的行为变革归根结底是主观意识引导的一种自发行为。因此,数据主义表现为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范式。与其说数据主义是最高价值的表现,不如说它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体现。在大数据技术的“光环”下,人类认识到数据化发展的巨大潜能,崇拜数据规律,重塑自身意识,形成源源不断的人类意识数据流。所以,将数据主义与“万物皆数据”思维对等是远远不够的,数据主义带来的不只是思维方式的变革,更多的是人类整体上的数据化表达,应将其上升到普遍意识形态的高度指导人类行为。

鉴于当下研究存在的局限性,笔者在充分吸收和批判现有观点的基础上,给出数据主义更为全面的哲学命题:数据主义代表着大数据时代的一种社会思潮,是人类意识形态上的数据化变革。具体来讲,数据主义已然被学界称作一种新兴宗教形式,人们对数据的极端崇拜使数据不断突破自我界限,打破生物与机器、虚拟与现实的隔阂,这种广泛的影响力在社会上掀起了一波热潮,是一种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社会思潮。同时,“意识形态”一词强调数据固有的偏向性,而不是通常意义上出于其他原因对阶级利益的扭曲理解。这种偏向性不是由某些利益集团人为设定的,而是由数据本身的虚拟结构和技术特征决定的,这些特征不受人意志的制约。于是,数据主义的出现深刻变革了原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人类意识形态的数据化变革实现了从思想到行为的全方位转换:人们对数据的无条件信任使数据成为衡量万事万物的标准,只有数据才能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并赋予一切以价值。其中,数据主义者强调用数据代表价值,而非以数据衡量价值。于是,数据主义从最初的“万物皆数据”思维逐渐转化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数据流,并不断内化于人们脑海中,形成既定的行为准则,是自我存在的量化体现。<sup>③</sup>

### 三、数据主义的生成逻辑:崇拜文化、技术建构与后真相社会

数据化过程是社会环境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伴随数据化发展,人们主动亦或被动地加入大数据时代,在数据主义思潮的裹挟下前进。因此,应以“数据主义是人类意识形态上的数据化变革”的哲学命题为全新起点,从文化、技术以及社会因素的不同角度探析数据主义的生成逻辑。

首先,自古至今根植于人类内心对神秘未知力量的崇拜本性是数据主义生成的文化基石。原始社会时期的宗教崇拜现象<sup>④</sup>与数据主义思潮的出现密不可分,宗教在人类认知迷茫中产生,表现为无条件相信和依赖自然的神秘属性,并根据神秘属性来判断自身行为。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曾

<sup>①</sup> 人工选择的进化过程是指,原初环境施加于大脑皮层上的变异的选择应以技术装置为中介,同时塑造个体适应过程和整个物种的进化,整个过程不涉及自然选择的获得性遗传。

<sup>②</sup> “数字人(digital native)”也被称作“数字原住民”,指伴随计算机网络成长的一代人。随着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加入,数据不再是以往孤立的数字存在,而是算法逻辑下能够影响人类认识和决策的“数据”。因此,联结数据流下的人们也被称为“数据人”。

<sup>③</sup> 即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这是人类存在的新方式。最初由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发起,是“运用技术手段,对个人生活中有关生理吸收、当前状态和身心表现等方面的数据进行获取”。

<sup>④</sup> 原始社会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极其不发达,人们更加注重对天地的探索与改造。由于当时认知水平的低下,人们对宇宙的一切未知都充满畏惧,自然也被赋予更多的神秘色彩,于是人们试图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来战胜自然的支配,将其神化为崇拜的对象。

对原始思维特征进行论述,认为人们不服从因果律而服从互渗律,即神秘力量在客体间的相互渗透,人们通过未知自然的神秘力量来认识和解释宇宙万物、生命意义、社会秩序、实践活动,外在表现为原始宗教的泛神灵崇拜活动。<sup>[22]</sup>

从原始宗教崇拜现象可以看出,崇拜是指人类对能够产生巨大价值的未知自然或社会力量的钦佩心理,以及对其无条件服从的行为。随着社会世俗化的发展,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使人们对自然神秘力量的崇拜逐渐转变为对技术迷思的崇拜。狭义上的迷思是指人类为了应对社会生活中难以完全解决的冲突而编造的神话故事,广义上的迷思是指一切无法解释说明的事物。而作为技术发展最新形式的大数据技术,其背后的复杂技术原理远超出大众的认知水平,造成数据迷思。人们在使用数据技术祛魅万物的同时,不断使数据技术自身附魅,导致对数据迷思产生敬畏心理。在大数据革命的冲击下,人类思想开始处于孕育无数迷思的混沌状态,对数据的一切都坚信不疑,甚至狂热崇拜。数据主义下的每个人都是数据的信徒,这种对数据的崇拜也是一种对数据内在神秘力量的追寻。

其次,大数据技术在信息维度上建构的“数据世界”是数据主义生成的技术动因。肯尼斯·库克耶(Kenneth Cukier)和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认为,随着互联网、云计算的高速发展,大数据技术逐渐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转变为数据的形式,即“数据化”的发展。<sup>[23]</sup>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化表达”不仅是自然科学数据化,还是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行为数据化。通过实时跟踪和预测人类的社会活动,量化一切社会行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据化。<sup>[24]</sup>因此,这种数据化也被称作“社会数据化”,即通过大数据技术的挖掘、收集和处理,实现数据过程价值的不断增殖,以惊人的速度颠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最终实现将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活动数据化的目的。<sup>[25]</sup>因此,“社会数据化”成为数字社会运行的基础,大数据应用的多样性突破了小数据时代的局限性。由此看来,大数据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并不只是一种人们用来分析、解释世界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其建构的数据世界实现了对现实生活的同步映射,在信息维度上充分展现了人类社会联系的客观映象。

大数据和算法技术建构的数据世界不仅为人类带来了崭新的世界图景,互联互通的数据形态更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型智库,从此彻底变革了人类的生存观念和意识结构,数据化表征成为社会行为的全部体现。数据世界赋予全体公民以数据身份,人们的交流不再只是身体与身体的在场,更多的是数据解码与编码的交互。数据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模糊了数据与物质之间的界限,开始走向虚拟现实的发展路径,即元宇宙的发展。借用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sup>①</sup>来描述元宇宙:我们的肉身被留在了物质世界,精神却“畅游”在数据空间,一根电源线实现身心联结。可以这样说,从增强现实变为虚拟现实的混杂,再到虚拟数据的全覆盖,数据本身作为能量融入时空,成为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于是,数据世界实现了从观念认知到意识形态,从同步映射到取代物质的全方位变革。

最后,后真相社会<sup>②</sup>提供了一种盲目崇拜、物性依赖的双重遮蔽环境,是滋生数据主义的肥沃土壤。数据的权威性在后真相时代的压倒性地位导致了数据主义的萌芽,人们成为后真相时代下被数据控制的物种。意见支配事实,情感支配理性,与其说是将真相束之高阁,倒不如说是让真相服从于人们的思想观点。<sup>[26]</sup>后真相时代是个人拜物的社会,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早在20世纪就预见媒介社会的发展,“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座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sup>[27]</sup>而对于人类未来的预测,波兹曼更偏向于赫胥黎式的文化发展。如今数据化的进步带来生产力快速提高的同时,人们的精神欲望难以得到满足,随着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人们的物性依赖变得越来越强,主要表现为对娱乐多样性的渴望和对信息时效性的需求。于是,“后真相”成为了如今“娱乐至死”社会的主流词。人们对触及自身利益的真相视而不见,沉浸在物性价值之中难以自拔。

<sup>①</sup> 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认为,心灵能够独立于肉体而存在,因此存在一个可能世界,这个可能世界里只存在心灵。身体与心灵不在一起,即“我的身体不必对应于我的心灵”。心灵的本质是思考活动,身体的本质是占据一定空间并拥有空间延展性。

<sup>②</sup> 所谓“后真相(post-truth)”,就是指在新闻传播中感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事实、真相往往被抛诸脑后,即“雄辩胜于事实”。

与其说是被数据控制,不如说是被数据背后的资本控制。“后真相”的盛行带来了一种崇尚意识形态的时代话语背景,资本、技术操纵下的后真相时代免不得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真相时代下的数据不再只是一种客观性表述,而是成为了新的权威意识形态。从某种程度上说,数据已经是后真相时代最接近事实的产物,成为了唯一理性、客观、权威的保障。公众对于数据权威性的追求为资本控制社会提供了完美的运作条件,媒介下的数据具备转移公众感知真相的能力,资本通过提供片面真相,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所以,资本已经透过数据,实现从内在主观性表述到外在客观性原则的整体渗透。于公众而言,放弃真相就等同于放弃自由,双重遮蔽的社会给予数据算法技术强大的控制力。

#### 四、数据主义的思想实质:从本体到实践的思想溯源

数据主义从最初的萌芽产生到如今意识形态的盛行,其思想耐人寻味。基于对数据主义的思考,许多学者也洞察到了数据主义的哲学本质和根源。譬如,迪克解构了数据主义这一数据化意识形态基础,认为其根源于有问题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主张。<sup>[6]198</sup> 闫坤如认为,数据主义的哲学本质是古希腊时期“万物皆数”思想的同步映射;<sup>[9]190</sup> 从黄欣荣与齐磊磊关于“大数据经验主义”的争鸣中,也可以察觉到数据主义背后的思想火花。为了进一步了解与剖析数据主义,试从这一意识形态范式的不同层次来探寻其背后真正的思想实质。

第一,在本体论层面,数据主义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万物皆数”思想的现代化发展,即“万物皆数”的复活。在毕达哥拉斯看来,数是万物的本原,数的原则支配着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数字已经成为一种取代、超越自然的“新自然”,数字公式是对自然深刻洞察的结果,表现为一种神秘主义的宗教信仰。后来的毕达哥拉斯主义信徒,如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在其科学研究中,都体现着“万物皆数”的信仰,开始走向自然的数学化之路,“数”也从狭义的数逐渐发展为完善的数学体系。

从“万物皆数”到“万物皆数据”,我们会发现,二者在以“数”表“物”的思想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具体表现因时代而不同,但数字信息背后蕴含的神秘力量却亘古不变,是一种本体论思想的回归。数据主义认为,数据是万物的表征,数据量化一切且通达真实世界。从计算机计数、运算、建模再到数码存储、传播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万物皆数”思想的折射,数据算法正在以一种不可替代的解析作用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人们依赖数据减少认知偏差、解决实际问题,并且认为数据能够打破生物和机器之间的隔阂,从数据世界到现实世界再到人类生命体征都由数据支配。大数据革命使客观事物以及主体认知世界的方式都向数据信息转化,最终所呈现的是“万物归数”的数据时代。因此,古希腊“万物皆数”的哲学思想和数据主义思潮有着共同的哲学本质,存在某种历史契合度,使数成为规则的理想在数据时代得以实现。

第二,在认识论层面,数据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用“相关关系”代替“因果关系”的经验主义思想的回归。随着技术性科学时代的到来,技术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显著提高,大数据技术为人们带来了许多颠覆性变革,开启了经验主义发展新浪潮。关于经验主义,特别要提及的是齐磊磊与黄欣荣关于“大数据经验主义”的争鸣。<sup>①</sup> 黄欣荣认为,大数据主义与大数据经验主义本质相同,所表述的是同一概念;<sup>[28]</sup> 而齐磊磊则认为,大数据主义与大数据经验主义本质上是和而不同的两个概念。<sup>[29]</sup> 鉴于对这一争鸣的思考,笔者认为,数据主义与经验主义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并非经验主义的最新发展形式。数据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经验主义思想的回归,是数据主义者的认识论变革。

<sup>①</sup> 齐磊磊认为,大数据经验主义主要有三个特征,即终结理论;相关性代替因果性;世界的本质既是混乱的,又是数据的。从这三大特征出发,黄欣荣在提出“大数据主义”与“大数据经验主义”是同一概念的基础上,批判论证了大数据主义的真实观点,认为大数据主义下理论并没有终结,仍应用于数据生产之中;比起因果性,更注重相关性;大数据使我们的世界变得透明。基于大数据主义与大数据经验主义的高榘,齐磊磊提出二者和而不同。一方面,从史蒂夫·洛尔关于大数据主义的定义来看,大数据主义是反对大数据经验主义的;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看,大数据经验主义是一种“强硬”的大数据主义。

图灵奖得主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对科学研究范式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包括依靠实际经验的实验科学(第一范式)、依靠数理模型的理论科学(第二范式)、依靠计算机仿真模拟的计算科学(第三范式)和如今依靠海量数据探索的数据科学(第四范式)。与计算科学不同的是,数据科学研究的侧重点已经从人脑分析转变为数据探索,即科学始于数据,数据是研究范式的中心。从“理论驱动”到“数据驱动”,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实现了经验主义范式的创新性复归。与传统的经验主义相比,虽然二者都崇尚实验经验优于逻辑推理,但大数据时代舍弃了对因果性的探寻,更加注重相关性的分析,走向一条创新性经验主义的发展进路。

大数据之父舍恩伯格认为,与因果性相比,相关性在大数据时代变得更为重要,它能更好地揭示问题并寻找答案,所以科学研究更加依赖数据分析方法,而非预设的理论规则。<sup>[30]</sup>这意味着,大数据的分析与使用不再需要预先建立全新的理论模型,数据间的相关性是大数据的本质特征。这带来了人们认知世界的全新方式:只需知其然,不需知其所以然。因此,大数据时代也被安德森(Chris Anderson)称为理论终结的时代。<sup>[31]</sup>数据主义者不再去追寻世界运行背后的深层内涵,理论演绎转变为直观归纳,通过相关关系下的经验归纳获取知识,从而进行个人意志的行动。简言之,数据主义者认为,大数据技术从理论回归经验,是一种高度量化、在线性条件和前提下可重复的经验主义,只要数据足够多,就一定能从海量数据中得出结论。

第三,在价值观层面,数据主义者奉行“数据解决一切”的“真理”,工具理性至上思想<sup>①</sup>已成为一种社会通用逻辑。与价值理性自身的复杂性、多元性、分歧性不同,工具理性作为一种达目的的手段,有着统一的评判标准,追求的是事物的高度精确性,习惯于将事物还原为数字符号等客观性的表达。将二者置于社会发展中,工具理性同价值理性的区别就更为突出。工具理性至上是人类的一种价值观偏好,主要以工具崇拜和技治主义作为自身的生存形态。大数据和算法技术的理性力量使人类摆脱愚昧,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产生活,因此,人们将工具理性视作一种时代需求。当人们将科技高速发展视作进步的前提时,整个社会都越来越重视计算和效率,工具理性的逻辑越来越强大,与资本逻辑并行不悖,工具理性已经逐渐从解放人的工具退化为一种统治世界的工具。大数据时代对量的强调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在数据标准化模式中计算生活,在量化一切中量化自己,成为数据时代的“一般数据”。在即时体验不断丰富的同时,人们的实体生命经验却越来越匮乏。<sup>[32]</sup>可见,数据世界使工具理性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位,大数据从实现目的的手段转变为一种目的,对大数据合理性的盲目认同使人们成为数据时代“单向度的人”。

第四,在意识形态领域,数据主义的出现是一种饱含欺骗性意识形态的技治主义幻想。在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看来,技治主义就是“工业社会用以达到它有组织整合的顶峰社会形式。”<sup>[33]</sup>概括而言,技治主义就是在推行技术治理下的一种社会形态。技术治理与工具理性相伴相生,工业革命的发展将科学技术推向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在技术治理逻辑下,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统治者是最出色的技术专家,采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实现社会整体的最优治理。

大数据技术的成功使人们逐渐开始相信数据的力量,认为能够通过数据的形式将世界祛魅。因此,大数据这一新兴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从技治主义思想中可以了解到大数据全面渗透社会治理的原因。首先,数据时代的人们对大数据和云计算的追捧使数据承载社会价值;其次,大数据技术作为一

<sup>①</sup> 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概念包含了主体、认知、行为、决策等多方面的理性要素,认为对于理性的判断在于是否合乎逻辑,即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的必然联系性,其中包括物质目标和价值目标。在此基础上,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合理性”概念,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合二为一。其中,价值理性重过程轻结果,是以理想信念或长远价值为行为导向,其行为活动是主体对价值世界的终极思考;而工具理性重结果轻过程,行动者的一切行为皆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准则。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而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就是工具理性,强调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化,技术越进步,对人类的摧残和奴役就越剧烈,即技术理性取代价值理性独占鳌头并支配各方。参见赫伯特·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105-106页。

种精确化、标准化的理性工具,能够较为客观、全面地反映事物本质并提供公平的解决方案;最后,统治者在社会治理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亟待寻求一套权威的技术体系进行有效实施和解决。

与理想化的技术治理不同,数据主义下的政治权力依靠大数据技术,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绝对统治。大数据从技术逻辑向资本统治逻辑转变,统治者通过诉诸数据的权威性,达到为自身辩护的结果,实现国家政治和大数据技术的权威一体化。如此一来,数据以价值中立的普遍认知遮蔽了技治主义思想的政治意向性,使阶级的意识形态难以察觉,成为一种隐蔽的权力。李醒民认为,技治主义实际上是科学主义在技术领域的“翻版”,全面渗透在社会政治领域中。<sup>[34]</sup>因此,大数据技术也成为了社会治理的固化力量。随着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不断浸入人类社会,资本以数据这种更为隐蔽的方式操纵一切,剥削人类的自由,使之丧失选择意义。

第五,在思想实践上,数据主义是计算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路径。计算主义认为,人类的本质从心灵到生命,再到宇宙整体,都是一种计算活动。<sup>[35]</sup>但是,这种思想一经出现,就遭到了多方反驳,被认为存在诸多“硬伤”,带来了离身性迷思。

首先,心灵的可计算性会掩盖人性的价值。人类的心灵思维具有“自我意向性”,也被莎士比亚称之为“一阶意向性”,即知道“做什么”。但是,图灵计算机的运作是一种客观的符号运算,不表现为任何指向性意义,无法实现心灵的自我意向性表达。其次,人工计算生命难以穷尽真正生命的特征。约翰·冯·诺依曼(Johann von Neumann)最早提出的细胞自动机强调了算法系统实现生命的自我繁殖特性,而生命的特征更在于环境作用和主体交流,这是计算生命所匮乏的。在此意义上,人类真正的生命是难以替代的。最后,宇宙世界与理想化的可计算世界并非同构。宇宙是一个巨型复杂系统,没有任何研究能表明宇宙包含的一切物质都能穷尽为可计算的产物,并且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将带来更多的不可计算性。

诚然,由于数据主义是计算主义的具体实践,所以计算主义的这种离身性迷思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数据主义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体现在人类思维的数据化,“万物皆数据”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只有数据才有意义,人们的所见所闻皆通过思维转换为数据的形式予以保存。其次体现在人类生命的数据化,数据赋予人类以数字生命,数据化的广泛普及又大大提高了数字生命的地位。数字生命突破人类的身体束缚,通过扩展和改造自身,实现人类由碳基生命向硅基生命的转变。最后体现在元宇宙下的数据化生存,元宇宙是数据世界发展的最终形式,数据主义者处于元宇宙的支配地位,以数据来解释虚拟与现实。也就是说,元宇宙不仅与现实世界同构,而且相互渗透,进而实现人类生存的数字化交互。

## 五、挽救人文:从后人类主义走向技术人文主义

毫无疑问,数字化生存带来了对人类认知的考验,是人类选择更多的自主性还是把选择权交给数据的一种人性挑战。数据主义的出现强烈地冲击着人文精神,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样态和生命体验,向人类的主体性地位发起了挑战。从表面上看,数据主义并不抵制人类意识的产生,但是从更深层次看,数据主义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人类意识数据流,使数据成为认知世界的方式,从而隐形控制人类意识形态。赫拉利道破了21世纪数据主义的重大迷思,批判数据主义将取代人文主义成为一种全新的宗教形式。人类的自由意志正面临危机,“一旦权力从人类手中交给算法,人文主义的议题就可能惨遭淘汰。只要我们放弃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而秉持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观,人类的健康和幸福看来也就不再那么重要。”<sup>[13]358-359</sup>数据技术使人类失去存在价值,人类将权力让渡给数据,成为一般数据流。



可见,现有关于数据主义的人文批判将数据主义视作一种后人类主义<sup>①</sup>的发展。数据主义者就是一种“人-数据”共生的后人类,这不仅否认了人类生命体验的独特性和主观意识的创造性,而且以技术便利性为由,造就了后人类宗教。后人类宗教的神圣数据流消弭了人与非人的边界,数据形态逐渐取代人类存在并占据主体支配地位。于是,数据主义的后人类发展实现了由人类数据化到数据生命化的过程,即“人的终结”。赫拉利就曾预言数据主义的未来,认为数据算法将成为“人类的黑客”。“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对个人主义的信仰将会崩溃,权威将从人类个人转移到网络算法上”,<sup>[17]333</sup>最后逐渐演变为数据与意识的脱钩。赫拉利将数据主义下的权威称为“智神”,认为他们才是未来世界的主宰者,是人类进化而成的新物种。

后人类主义的发展路径造成了人类生存焦虑的精神困境,传统的人文主义已经在大数据技术的全面渗透下终结。而传统的数据主义人文批判局限于人类与技术的主客体关系,使技术与人文陷入主客二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智神”降临的数据主义还原了人类的原初位置,重新审视人与技术的关系或许能成为这一时代语境下挽回人类主体性的转机。美国学者约翰·杜威(John Dewey)就曾提出“科学人文主义”,试图弥合人与科技的鸿沟,提倡科学的人文化发展。而如今的科技已经进入技术化生存时代,人们的关注点也应从科学逐渐转向技术。于是,为挽救数据主义下失落的人文,重拾人类的存在意义,数据主义应走向未来的“技术人文主义”。技术人文主义认为,“人-技”共生关系应是人类存在的技术维度,强调技术背后人类的延异性在场,技术与人具有同构性,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因此,技术人文主义就是在承认“人-技”共生的“后人类”基础上,坚守人类的主体性本质。

技术人文主义认为技术与人文具有同一性,所以,数据主义不仅具有非人文性,还包含人文特性。虽然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日益自成系统,但发明创造大数据技术的探索阶段是包含人类意识意指性的。特别是数据记忆的出现弥补了人类原初记忆存在的缺失,从技术维度拓展人类的记忆功能,以数据的方式满足人的记忆需求。也可以说,大数据技术是按照人类的要求满足和控制人类,应是人类神经中枢的技术延伸。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认为:“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的空间延伸。今天,经过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electric technology)发展以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sup>[36]</sup>因此,数据技术是人的内在性技术,数据主义的“数据中心论”依然是“人类中心论”的变体,而数据主义的未来就是人类技术性本质的体现,后人类宗教中人们所崇拜的数据流也是一种对增强自我的崇拜。大数据技术实现了人类迭代升级的变革,通过这种自我变革,人们将获得应有的地位,成为自己的神。所以,数据主义永远无法终结人类的意义世界,技术人文主义下的人类主体性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人类的技术性本质上。数据主义的数据意识仍是人类的创造性意识,数据文化是人类技术性的外在现象,人类依旧是故事的叙事中心。

不论何时,坚守人之本质都是面对一切困境的最佳手段。只有在承认“后人类”的时代语境下,反身叩问人类的存在意义,才能重启数据主义下的人文主义传统。技术人文主义下的一切“人-技”共生关系都是人类自我存在的新维度,一切数据自由终将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为避免人类陷入自我毁灭的危机,人之为人的反思性意识变得更加重要。为此,应构建关于数据主义的新技术人文伦理,这种伦理体系并不是要拒斥数据化的发展,而是要求人类主观能动地去调节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技术性变革,赋予数字生命以道德伦理。如此一来,技术人文主义使数据主义不再是一种人文主义危机,而是人文主义的继续发展,使人们在数据主义时代获得一种崭新的超越性力量,进而去设想、唤醒、争取属于人类自己的未来。

<sup>①</sup> 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是一种去人类中心论,是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与批判。美国学者海勒(Katherine Hayles)提出,人类的现实具身形象是历史偶然的产物,随着人机边界消弭,人类最终会被技术义体所取代。因此,后人类主义主要考察的是人类的非实体属性,即“人-技”共生性。人类或者智人不再被看作特殊的、优于其他动物或者机器的存在。“后人类”构成了一个更为彻底的他者,它迫使“人类”从先在的、具有元话语性的位置变成了可以讨论、追问的事物。参见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7页。

## 参考文献:

- [1]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15.
- [2] 魏辰,吴永忠.探寻数据主义的消解之道[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6):1-5.
- [3] 史蒂夫·洛尔.大数据主义[M].胡小锐,朱胜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6.
- [4] BROOKS D. The philosophy of data[N]. The New York Times, 2013-02-04(1).
- [5] HARARI Y N. Yuval Noah Harari on big data, Google and the end of free will[N]. Financial Times: Magazine Life & Arts, 2016-08-26(3).
- [6] VAN DIJCK J. Datafication, dataism and dataveillance: Big data between scientific paradigm and ideology[J]. Surveillance & society, 2014(2).
- [7] 李伦,黄关.数据主义与人本主义数据伦理[J].伦理学研究,2019(2):102-107.
- [8] 杨子飞.“第三洞穴”与“数据主义”——论大数据社会科学的内在矛盾[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8):63-67.
- [9] 闫坤如.数据主义的哲学反思[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4).
- [10] 闫坤如,李翌.数据主义及其人文坎陷[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3(3):39-45.
- [11] 尼古拉斯·卡尔.数字乌托邦:一部数字时代的尖锐反思史[M].姜忠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8.
- [12] 文森特·莫斯科.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M].黄典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110-131.
- [13] 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 [14] 田锋,缪听雨.论数据拜物教的生成路径与祛魅之道[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120-126.
- [15] KOBELIEVA D L, NIKOLAIENKO N M. From information search to the loss of personality: The phenomenon of dataism [J]. Anthropological measurements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2021(20).
- [16] PETERS T. The deluge of dataism: A new post-human religion? [J]. Dialog, 2017(3):211-213.
- [17] HARARI Y N. 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M].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2016.
- [18] PETRI D. Big data, dataism and measurement[J]. IEEE instru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 magazine, 2020(3).
- [19] 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72.
- [20]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6.
- [21] STIEGLER B.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22]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08.
- [23] CUKIER K, MAYER-SCHONBERGER V. The rise of big data: How it's changing the way we think about the world[M]// PITICI M. The best writing on mathema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 [24] BILTGEN P, RYAN S. Activity-based intelligence: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M]. Norwood: Artech House, 2016:182.
- [25] O'NEIL C, SCHUTT R. Doing data science: Straight talk from the frontline[M]. Sebastopol: O'Reilly Media, 2013:260.
- [26] MARI L, PETRI D. Measurement, dataism and post-truth ideology: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J]. IEEE instrumentation & measurement magazine, 2022(7):3-6.
- [27]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93.
- [28] 黄欣荣.大数据主义者如何看待理论、因果与规律——兼与齐磊磊博士商榷[J].理论探索,2016(6):33-39.
- [29] 齐磊磊.大数据主义与大数据经验主义——兼答黄欣荣教授[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6-21.
- [30] MAYER-SCHONBERGER V, CUKIER K. 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91.
- [31] ANDERSON C. The end of theory: The data deluge mak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bsolete[EB/OL]. [2022-12-02]. <https://pdodds.w3.uvm.edu/files/papers/others/2008/anderson2008a.pdf>.
- [32]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39.
- [33] ROSZAK T. The making of counter culture: Reflections on the technocratic society and its youthful opposition[M]. New York: Doubleday Company, 1968:7.
- [34] 李醒民.论技术主义[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1-5.
- [35] 李建会,符征,张江.计算主义:一种新的世界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
- [36]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4.

- [17] 肖海军. 营业权论[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7: 43-46.
- [18] 罗培新.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 方法、规则、案例[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20: 2.
- [19] 杨曦. 截至9月底中国登记在册个体工商户达1.11亿户[EB/OL]. [2022-12-10]. <http://yn.people.com.cn/n2/2022/1026/c372455-40169875.html>.
- [20] 曹兴权. 民法典如何对待个体工商户[J]. 环球法律评论, 2016(6): 151.
- [21] 青岛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青岛调查队. 2021年青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2-12-10]. [http://qdtj.qingdao.gov.cn/tongjisj/tjsj\\_tjgb/202204/t20220414\\_5485242.shtml](http://qdtj.qingdao.gov.cn/tongjisj/tjsj_tjgb/202204/t20220414_5485242.shtml).
- [22] 李翔. 北京商事领域改革再出惠企实招[N]. 中国市场监管报, 2022-05-19(A1).

## Guarantee and Optimization of Business Freedom in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System

HUANG Xiaol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90, China)

**Abstract:** Since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system involves two branches of law: commercial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aw, it is difficult to clearly define it as a part of private law or public law. Its essential function is to confirm the qualification of commercial subjects and publicize business information. The reform of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system in China is to weaken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control and resume its essential function, aiming at releasing the operation freedom of market players and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the market. Due to the narrow scope of exemption registration and the broad scope of compulsory registration, as well as shortcomings in efficiency and service quality of grass-roots registration organ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which restrict business freedom, it is suggested to draw lesson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and local pilot places to give market players greater business freedom and improve business efficiency on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market order.

**Key words:**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business freedom; efficiency; market order; publicize information

(责任编辑:董兴佩)

(上接第10页)

## Theoretical Traceability of Dataism and Its Technological Humanistic Future

WU Yongzhong, WEI Chen

(School of Marxis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Dataism represents a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and it is a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human ideology.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dataism is the combined result of cultural,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factors. Among them, the worship nature to mysterious and unknown forces rooted in human hearts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is the cultural cornerstone for the generation of dataism. The “data world” constructed by big data technology in the information dimension is the technical motivation for the generation of dataism. Post-truth society leads to the double shading environment with blind worship and physical dependence, which becomes the fertile soil for the generation of dataism. The essence of dataism includes the ideological tracing from ontology to practice. At the ontological level, dataism is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the thought that “‘Number’ constitutes the essence of everything”. At the epistemological level, dataism is a return of empiricism. At the level of values, dataists adhere to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at “data solves everything”.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dataism is a technocratic fantasy full of deceptive ideology while in terms of ideological practice, dataism is the specific practical path of computationism. Therefore, the emergence of dataism has challenged the status of human subjectivity. In order to save the lost humanity, dataism should move towards “technological humanism”. All “human-technology” symbiosis under technological humanism is new dimensions of human self-existence, and all data freedom will eventually be the embodiment of human free will.

**Key words:** dataism; computationalism; technocracy; post-truth; technological humanism

(责任编辑:江雯)